

教师职业生涯起步的教育叙事^①

威廉·派纳¹著,徐文婷²,朱晓雯²编译

(1.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教育学院,温哥华 V6T 1Z4;2. 西南大学 教育学部,重庆 400715)

摘要:每当回忆我教师职业生涯起步的第一年,那些地方、那些人、那些事,都令我感慨万分。面对学生的挑战和职业发展的困惑,我时常感到焦虑,但我逐渐意识到个体和社会活动与文学文本结合之重要与必要。我感谢入职第一年的教育经历。尽管目前面对着时代的激流,我偶尔感到沉重,但重新激活过往辉煌的呼声却一直清晰嘹亮地响彻着。

关键词:教师职业生涯;教育经历;课程研究;对话际遇

中图分类号:G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129(2015)04-0013-05

一、同事与学生

1972年6月,我在获得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博士学位后,开始踏上前往美国西部的旅途。在丹佛,我决定回去,原因很简单,因为我受够了这种孤独的感觉。回想起来,我的目的地其实是旧金山(当时美国的同性恋之都)。可能是由于无意识的原因,几年前我就准备去旧金山。我致电“遴选委员会”的负责人威廉·劳(William T. Lowe)先生,此人聘用我,并热心地安排我教授暑假的课程。在此,我毫不夸张地说,威廉·劳对我的帮助很大,尤其是在最初几年。虽然,在能力上我们存在着差异,但他从未以此来嘲弄我。在我入职的第一年,几乎就像其他所有同事一样,他的行为是无可挑剔的。他毫不在乎公立大学对我刻薄的评论,甚至将其视为一种恭维。今天,教职员工的情况明显恶化,不仅仅局限于美国。学术劳动的“高强度”,部分原因在于“问责制”。

当我走进罗切斯特大学滨河校区时,我诧异于我和学生之间的年龄差距。在我担任本科生英语助教之前的时间里,我的学生都是本科生,其中大部分学生比我稍年轻。那个夏天,在罗切斯特大学的课堂上坐满研究生——实习教师,他们年龄比我稍大,但都不到25岁。有一次,我列出了几位我感恩的教师,当时我在思索,我曾经在公立学校上学和执教的“教育经历”使我对教师怀着敬重之心,这种敬重是否因为我在罗切斯特大学的第一个夏天而有所加深。我并非一向顺从于长者,因为在几年前,“年轻”一词隐含着道德优势。学生抗议的是陈旧的观念,他们将其归咎于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把暗杀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

① 本文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课程理论专家威廉·派纳先生对自己教师职业生涯第一年所面临的工作、生活的回顾,表达了他对教学和人生的感悟,尤其是对“教育经历”与“对话际遇”的领悟。自1972年起,他对课程理论、教学实践、人生意义的探索从未止步,通过厘清何为“应做之事”与“重要之事”,把握生命的短暂性、重要性以及生活与职业的关联性,逐渐将自己的职业与人生引出混沌,走向理性。——译者注

收稿日期:2015-03-12

作者简介:威廉·派纳(William F. Pinar),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世界知名课程论专家。

徐文婷,西南大学教育学部硕士研究生。

朱晓雯,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

和种族骚乱以及越南战争这些具体事件抽象化。

在入职的第一年,年轻的我面临诸多困惑。大学生们对我所教授的英语教学方法心存疑虑。有几位智力超群的大学生挑战我的“教学方法”,批评我坚持采用“对话际遇”(dialogical encounter)的方式来强调个体、社会活动与文学文本的结合。相比之下,我的助教——博士研究生们在第一学期就获得了大家的认同。我开始依靠我的助教,尤其是玛德琳·格鲁梅特(Madeleine Grumet)。在我们相识后第二年,玛德琳成为助教。在教学过程中,她避开了“标准化教学方法”的影响(如今,标准化教学方法已经演变为“最佳做法”,但是“反智主义”^①仍然存在)。随后,玛德琳开展了相应的练习,并且通过十年的时间,使我们认同了“教学方法”,可参考我们于1976年出版的《走向贫乏的课程》一书^②。在入职的第一年,我遇见了硕士研究生珍妮特·米勒(Janet L. Miller),我们成为了亲密的朋友。珍妮特将前往哥伦布市,并在我的导师保罗(Paul R. Klover)的指导下继续深造,完成博士课程的学习任务以及相关的研究工作^③。随后,我和珍妮特一同负责贝加莫会议的工作,并在《课程论杂志》上开展合作^④。

在入职的第一年,我还遇见了珍妮·科曼(Jeannine Korman)和玛格丽特·柴康(Margaret Zaccane),并与这两位秘书结下了友谊。我邀请来自法国的珍妮·科曼在切斯特·皮埃尔·亚历山大街用餐,在那里她教我品尝法国的美食,并约定教我三年的法语。她通过干预措施来改善我的发音,教学时她温柔而坚定,在纠正错误的同时鼓励我继续努力。在我看来,她无疑是教师教学的典范。她出生并成长于罗切斯特,曾经是伊士曼音乐学院的员工。玛格丽特·柴康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便负责处理贝加莫会议的相关事务以及《课程论杂志》的财务问题,并且与她的朋友多萝西·霍顿(Dorothy Horton)共同管理会议登记处。为处理税务问题,她甚至还学习了加拿大的税法,以便继续帮助我,使我能在加拿大工作。我们每两个月交谈一次,共同回忆我们在罗切斯特大学度过的美好时光。

另外,在助教的帮助下,我监督学生学习“教学方法”课程(在9月份),因为他们需要参与“实践教学”(在10月至12月期间)。我们参观了位于罗切斯特市区和郊区的不同学校。这些学校不仅给我们展示了各具特色的课堂教学,还帮助我们了解这个曾经充满活力的城市,更帮助我找到“复杂对话”的方式。我把我的课程理念总结为《理解课程》一书^⑤。对我而言,“对话际遇”是一个重要的理念。我曾鼓励那些实习教师,引导他们提高对教学的认识,并强调教学的职责在于坚持对话,促进专业素养的提高。对话的活力、精妙之处、精确度、复杂性和直接性反映教学质量,而高质量的教学也始终处于对话的语境之中,从不单独进行,即使我们有时使用的是俚语或讲演的形式。没有目标,没有结果,没有任何事可提前而知。相反,我支持不同的学生在特定的日子里执行特定的任务。没有人事先知道会是怎样。我提倡即兴创作、见多识广、职业道德以及自知之明。教学是一种复杂化的、参与式的对话形式,其中不仅包含着参与者现在的不同观点,而且包含着参与者以前的不同观点,甚至还包含着那些我们对拜读和讨论过的作品所持的不同观点以及那些作品的分析者所提出的对我们颇有启示和重要意义的观点。对我而言,对学生的教学督导是我曾经在秋季教过的“教学方法”理论课程的延续^⑥。

① 参见:Grumet, Madeleine R. Bitter Milk.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1988.

② 参见:Pinar, William F. and Grumet, Madeleine R. Toward a Poor Curriculum. Troy, NY: Educator's International Press,1976.

③ 参见:Miller, Janet L. The Sounds of Silence Breaking and Other Essays: Working the Tension in Curriculum Theory. New York: Peter Lan,2005.

④ 参见:Pinar, William F. Ed. Contemporary Curriculum Discourses: Twenty Years of JCT. New York: Peter Lang,1999.

⑤ 参见:Pinar, W., Reynolds, W., Slattery, P., Taubman, P. Understanding Curriculum. New York: Peter Lang,1995.

⑥ 参见:Pinar, William F. Autobiography, Politics, and Sexuality: Essays in Curriculum Theory. New York: Peter Lang,1994.

二、教学与文学

在入职的第一年,我教两门研究生课程,一门是英语教育,另一门是课程理论。虽然课程理论一直是我在研究生阶段学习和研究的第二领域,但在入职第一年里我就将其作为我的主要兴趣。在1973年的春天,我一直强调“教育经历”这个我曾经听闻德韦恩·许布纳(Dwayne Huebner)提及的概念(1969年,当我是一名学生时曾参加过他主持的研讨会),讲述这个概念富有理性的来历^①。马丁·杰伊(Martin Jay)的权威研究是在几十年以后,所以我主要讲授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尼采(Nietzsche)、海德格尔(Heidegger)和萨特(Sartre)的教育经历。在第一年,我讲课的内容主要源自于我在俄亥俄州立大学阅读书籍和上课时做的笔记。当时,作为一名大学生,我已获准进入哲学系学习研究生课程。选修研究生课程以及所做的笔记使我在教学中得心应手。与此同时,我亦从其他本科课程中获取知识并做好笔记。现在这些笔记存档于路易斯安那州大学的图书馆,而我本科所用教材仍放置在我家的书架上。正如任何教师都知晓,通过教育经历学会的学科知识将更加深刻。

安德鲁·坎普(Andrew T. Kemp)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你如何获得成功;二是从今天开始,你会给自己何种建议。我将从第二个问题开始回答,但与此同时也意味着我对第一个问题作出了回答。事实是我不确定是否会从今天开始。当然,今天我不可能是一所公立学校的教师。40多年来的教学转型导致许多学校并不适合于儿童和教育工作者,北卡罗莱纳州的穆尔斯维尔似乎就是一个例子。虽然1972年不是美国高等教育的“黄金时期”,当时反对知识分子的倾向明显(这种倾向通常概括为高等教育“公司化”^②),但是,正如麦金太尔所指出,企业化的大学不值得称赞。对教师是否晋升和任期长短的评定是可以量化的。我们研究“成功的”教学手段,试图通过具体数据来衡量“影响力”以及确定哪些期刊是有影响力的。对审查论文的专家和当选为专业协会的期刊编辑而言,“服务”不仅意味着需要参加系、教育学院以及大学的会议,而且也意味着审查手稿。“服务”与当地的专业协会同样也会受到审查。“论文审查”逐渐变得重要,这大概与科研生产力联系在一起^③。

在1972年,不仅是我的年龄在提醒我,而且我的资深同事也在提醒我——应安排时间来做一些被认为重要的事。“重要的事”是难以被量化的,我的晋升和终身任期不仅取决于我的学术研究成果,也取决于同事的投票(主要指大学学术委员会成员的投票)。在当时的罗切斯特大学,有一个专门的委员会负责人员的晋升和授予终身教职的事项。“重要的事”,在英语、哲学和历史学系将由同事对此作出判断(我后来才知晓)。他们用打字机打出的17页密密麻麻的对我工作的评估与要求,令我印象深刻。这样的要求使我把致力于学术研究作为我的主要任务,而不是进行教学,当然更不是社会服务。虽然这三者可能是相互结合的,但此时对我来说,教学与社会服务远不如学术研究重要。在1972年的罗切斯特大学,人们表示想要在委员会任职无疑冒着损害自己学术声誉的风险。任何类似于官僚主义的工作都被视为“家政”,不适合严肃的学者。官僚主义不仅是乏味与耗时的,它还抹杀我们的智慧。学术研究更为重要。对于一个在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领域训练有素的人而言,研究仍然意味着阅读、思考与写作。

我在研究生院的导师保罗一直鼓励我涉猎教育研究领域以外的书籍。我在英语系修读完我的大部分课程,在那里我接触到了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的小说。那一年知识界发生的

① 参见:Huebner, Dwayne E. *The Lure of the Transcendent*.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1999.

② 参见:Pinar, William F. *Curriculum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tellectual Histories, Present Circumstance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③ 参见:Pinar, William F. *The Worldliness of a Cosmopolitan Education: Passionate Lives in Public Service*.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大事是昆廷·贝尔(Quentin Bell)所著的《弗吉尼亚·伍尔夫传记》出版。在拜读贝尔所著传记的同时,我还致力于研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达洛维夫人》^①和《到灯塔去》^②以及《远航》^③。通过集中精力研读《远航》,我证明了我的教育经验,即教育在于“学”而不在于“教”。在这些小说中,作者着重强调普通日子的短暂性、重要性和关联性,它们隐藏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我们不去注意,将很难发现和理解。伍尔夫的作品深深地吸引了我。直至今日,我仍然渴望阅读文学学者对伍尔夫的评价。我将伍尔夫的作品和观念引入我在2013年关于课程研究的欧洲会议上所作的主题演讲中。伍尔夫的诗性、才华和她面对神圣与庸俗下流的态度始终让我保持着坚定的信念。我曾想自杀,但是我的懦弱意味着这种想法将变为安眠药。在1972年,对弗吉尼亚·伍尔夫作品的研究,不是我全神贯注地关注她作品和生活的尾声,相反,而是对“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这个知识分子小团体产生研究兴趣的开端。在我搬到小镇后的第一年,我在研究生院学习和工作期间的密友弗朗辛为了在罗切斯特技术学院教授电影学,也搬到此地。在罗切斯特,弗朗辛(Francine Shuchat Shaw)和我幻想着组织一个小组,关注人文领域。一年之后她离开了罗切斯特大学,前往纽约大学任教。另外,我也记得我曾沿着罗切斯特的公园大道漫步而行,然后在简(Jine)所在的咖啡店喝咖啡,当时同我一起喝咖啡的还有菲利普·韦克斯勒(Philip Wexler),我们成为了朋友,并一起度过夏日。1981年,我领衔的“遴选委员会”聘请了韦克斯勒先生。当我在1985年离开罗切斯特大学时,韦克斯勒成为院长。在20世纪80年代初,他成为一位批判理论家,如今他把社会学和神秘主义融合在一起^④。

在我作为助理教授的第一年里,是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生活和作品吸引了我,让我考虑应该去做什么。说“应该”,是因为我强烈地或者说潜意识里感受到教授这一职务的权利、责任以及应有的尊严(正如安德鲁·坎普所描述的)。虽然我清楚地知道需要做一些重要的事,但我不知道“重要的事”是什么。除了研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写作和生活,特别是她的意识流写作及日常的祈祷,我日常生活的主要焦点还集中于课程研究^⑤。正因为学习和研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作品,所以此时此刻,我才会重新把文学作品的学习与教学经历作为课程,我才意识到文学与教学的关联性,而在入职的第一年,我还未意识到这点。我把我的论文扔在一旁,把精力放到曾被放弃的意识和文化修养以及观念的革新上。另外,从莱茵的教育分析中我获得了灵感,随后出版了《理智、疯狂和学校》。我将研究聚焦于人文课程,其中主要围绕“对话际遇”。我重新审视了我曾强调的“对话际遇”,它来自于我在大学四年级时所阅读的弗莱雷的作品。我再次在我的“研究”中强调“对话际遇”。我从未远离过人文学科。

三、生活与收获

1972年7月,我抵达了罗切斯特,找到房东之后,我搬入了位于小镇南部郊区中被废弃但仍可租住的小屋。我很快在那里找到了另外两位女性合租人,一位是高中毕业生南希(Nancy Fruchtman),另一位是她的朋友马乔里·哈珀(Marjorie Harper)。回想起来,在大学工作和日常生活的重压下家庭给我提供了一种平衡,使我能静下心来进行课程研究。很快,我开始在位于阿诺德公园的罗切斯特禅宗中心静坐冥想,在那里由菲利普·开普鲁(Philip Kapleau)教我们如何坐禅^⑥。我试图把所有研究的东西呈现在一篇我将要发表的文章中,但呆板的文章完全不像弗吉尼亚·伍尔

① 参见:Woolf, Virginia. *Mrs. Dalloway*. New York: Harvest,1925.

② 参见:Woolf, Virginia. *To the Lighthous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mpany,1955.

③ 参见:Woolf, Virginia. 1920. *The Voyage Out*.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mpany,1920.

④ 参见:Wexler, Philip. *Mystical Sociology. Toward Cosmic Social Theory*. New York: Peter Lang,2013.

⑤ 参见:Pinar, William F. *Curriculum Studies in Brazil*.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11.

⑥ 参见:Kapleau, Philip. *The Three Pillars of Zen*. New York: Random House,2000.

夫的风格。

1973年在罗切斯特召开会议,一定是保罗的主意。我无法想象自己会有信心组织召开全国性的会议。参加会议的一些学者是我在研究生期间十分仰慕的,如唐纳德·贝特曼(Donald Bate-man)、玛克辛·格林(Maxine Greene)、德韦恩·许布纳(Dwayne Huebner)、詹姆斯·麦克唐纳(James B. Macdonald)、威廉·皮尔格(William Pilder)以及罗伯特·斯塔雷特(Robert Starrett)等学者。当然,我也不清楚该邀请谁来旁听。因此,保罗承担起策划的工作,甚至也许准备了我可能“调整”的方案,然后找到了我们的资助者詹姆斯·多伊(James Doi)院长(他后来成为华盛顿大学的院长)。演讲结束后,小组成员与领导们一同探讨每个主题演讲的内容,不仅认可了我感兴趣的“对话际遇”,并且参与到乔治·康茨(George Counts)发表传奇性演讲后自发形成的群体中^①。我开始思考这6位学者完成“课程理论的重构”工作后课程研究的发展前景^②。

在入职第一年,似乎什么都没解决,而现在似乎一切都解决了。我感谢自己还活着,但是寻找活着的意义是个漫长的过程。呈现在我面前的情景也曾引发了我深深的焦虑。现在,我应对焦虑情绪的方式是从跳跃思维转为认真投入,从感性走向理性。我经常退却,现在仍在退却进而陷入孤独,在孤独时我反复思考需要做些什么,特别是在“问责制”通过电子传媒得以广泛实行之时,我更应思考何为“应做之事”。电子邮件虽然带来极大的便利,但伴随“问责制”的兴起,我的电脑屏幕仿佛变成了无形监狱。当我在办公室跳华尔兹时,玛格丽特偶尔会说“你有一封信”或者“你有一个电话留言”。我需要通过电脑解决一些问题。实际上,今天、明天、本周、下个月,总有“下一件事情”。我将任务排好序列,从较大的项目着手,而不是等到以后,劝诫自己做现在必须做的事情。回顾过去曾经帮助我的人、生活的地方、发生的事,我感谢入职第一年的教育经历。尽管目前面对着时代激流,我偶尔感到沉重,但重新激活过往辉煌的呼声却一直清晰嘹亮地响彻着。

An Educational Narrative of Teacher's Early Career

William F. Pinar¹, Translated by XU Wen-ting², ZHU Xiao-wen²

(1. Faculty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Vancouver, B.C.V6T 1Z4, Canada;

2. Faculty of Education,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Whenever recalling in the first year, I was full of emotional thoughts. I would be signed by those places, people or events. In that first year, I always feel anxious when faced up with the provocations from students as well as the prospect of my career. But gradually, I realized the significance and necessity of combination of individual and social activities with literature texts. Despite the riptide that is the present and the occasionally crushing weight of age, reactivating the past keeps the calling loud and clear.

Key words: teachers' career; teaching experience; curriculum research; dialogical encounter

责任编辑 秦 俭

① 参见:Pinar, William F. Heightened Consciousness,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Curriculum Theory: The Proceedings of the Rochester Conference, Berkeley, CA: McCutchan,1974.

② 参见:Pinar, William F. Curriculum Theorizing: The Reconceptualists. Berkeley, CA: McCutchan,1975.